

中国

近现代史述要

王宪明 蔡乐苏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教育部《中国近现代史》课程教学大纲的配套教材，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及相关专业的重要参考书。本书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主线，以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重要历史文献为切入点，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脉络和主要成就。本书注重史论结合，既注重史实的叙述，又注重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和爱好者参考。

中国近现代史述要

王宪明 蔡乐苏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010) 62770172 010-62770172

清华大学出版社 (CIP) 数据

中国近现代史述要 / 王宪明、蔡乐苏主编.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302-17121-2

I. ①中... II. 王... III. 中国—近代史—研究 IV. K260.7

0250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3387号

责任编辑: 王宪明
封面设计: 蔡乐苏
责任印制: 王宪明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社址: 北京, 010-62770172

社址: 北京, 010-62770172

社址: 北京, 010-62770172

社址: 北京, 010-62770172

社址: 北京, 010-62770172

社址: 北京, 010-62770172

社址: 北京, 010-62770172

社址: 北京, 010-62770172

社址: 北京, 010-62770172

社址: 北京, 010-62770172

清华大学出版社 (010) 62770172 010-62770172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全书共13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央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关批示精神为指导,在继承清华大学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改革成果并充分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国内外原有的和近年来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围绕建设现代国家这一主线,对鸦片战争前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研究,以帮助读者了解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自由、民主的艰难历程,了解中国近现代化进程长期受挫的内外原因,认识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史述要/王宪明等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4
ISBN 978-7-302-17153-9

I. 中… II. 王… III. ①中国—近代史—研究 ②中国—现代史—研究 IV. K250.7
K2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8385 号

责任编辑:马庆洲

封面设计:常雪影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王秀菊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230 印 张:33.25 字 数:603千字

版 次: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46.00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28536-01

主 编：王宪明 蔡乐苏

副主编：欧阳军喜 张 勇

编委 (按音序排列)：

蔡乐苏 陈争平 董士伟 冯永亮

华 表 欧阳军喜 戚学民 舒 文

王 奇 王宪明 翁贺凯 张 勇

各章分工：

第一、二章：王宪明

第三章：董士伟

第四章、第五章：欧阳军喜

第六章：王宪明 华 表

第七章：戚学民

第八章：蔡乐苏

第九章：舒 文

第十章：王 奇

第十一章：张 勇

第十二、十三章：蔡乐苏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一、历史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二、“近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观念,而是有其特定的内容	4
三、近现代历史的主题是建设现代国家	7
第二章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5
一、康雍乾盛世及其失误	16
二、鸦片战争	21
三、太平天国	36
四、洋务运动	47
第三章 觉醒:从维新到革命	66
一、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67
二、维新变法	75
三、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81

四、革命与立宪	88
第四章 痛苦的转型:民国初年的政治与文化	101
一、民初的建国构想与实践	102
二、政党政治的追求与失败	111
三、帝制与共和的较量	120
四、新思想、新文学运动的兴起	132
第五章 救国的新方向:新信仰、新组织、新革命的出现	140
一、“一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浪潮与中国思想界群体趋向 社会主义	141
二、思想的分裂: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的几个问题	149
三、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56
四、国民党改组与大革命的兴起	159
第六章 进城与上山:二三十年代国共两党对建国道路的探索	176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及其内政外交举措	177
二、共产党发起土地革命	212
第七章 正面战场的抗战	239
一、西安事变前后	240
二、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抵抗日寇的英勇战斗	248
三、重庆领导下的正面战场和政治举措	259
第八章 抗日游击战、“三个法宝”与新民主主义理论	268
一、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	269
二、武装斗争与群众路线	284
三、党的建设与实事求是	293
四、现实与理想之间:新民主主义论	310
第九章 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28
一、“二战”后国际形势和美苏对中国命运的安排	330

二、重庆谈判	336
三、铁老虎,纸老虎	346
四、未经过战略相持的战略进攻	351
五、三大战役一盘棋	355
六、“一边倒”	361
七、新政协、《共同纲领》与新中国的成立	365
第十章 中苏同盟	373
一、“一边倒”外交战略	374
二、米高扬秘访西柏坡	380
三、刘少奇秘访莫斯科	384
四、毛泽东首次访苏	389
五、两个《同盟条约》	397
六、“156 项工程”与中国工业化	404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	414
一、“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	416
二、“天下大治”与“天下大乱”	428
三、“这笔‘遗产’要交给下一代”	437
第十二章 为什么毛泽东与尼克松迟迟才握手言和	449
一、“二战”后中、美对抗的根源	450
二、毛泽东关于美国及国际问题言论录要	460
三、中美关系的春天终于来临	473
第十三章 历史的转折	488
一、一石激起千重浪	489
二、民心	499
三、邓小平言辞中的“四人帮”之罪	502
四、教育科技、按劳分配与开拓产业	507
五、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较量	512
六、定局:中央工作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517

第一章

导 言

中国近现代史是近现代中国的国史,主要记述和探讨自1800年以来,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今天为止从全局上对中华民族命运和国家发展前途有重要影响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首先宜确立以下观念,即:一、历史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近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观念,而是有其特定的内涵;三、近现代史的主题是建设现代国家。现分述如下。

一、历史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从宗教中寻求人生归宿的传统不同,中国文化很早就已经觉悟到,人是历史的动物,人生于历史之中,长于历史之中,创造于历史之中,最后又归于历史之中。唯其有史,人才成其为人;唯其有史,人才能够年积代累,起点一代更比一代高,境界一代更比一代美;唯其有史,立功、立言、立德者,为国家、民族发展做出重大发明创造和贡献、牺牲者,以及大奸大恶、为害国家民族者,才得以记录在案,昭示警醒后人,激励来者。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之所以敢于敞开胸怀,大胆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因为他们深知自己在长长的历史序列中所处的位置和使命,不仅要承担起“往圣继绝学”的责任,而且更要负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只有这样才能够将一个生物体的、茫然的“小我”及其有限的生命,凝聚成无穷的、历史的、有意义的“大我”。^① 因此,历史在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②、“不知来,视诸往”^③、“述往事,思来者”^④的传统,一部《春秋》,其“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⑤一代代良史不计个人得失和生命安危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就其“一家之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屡遭危难而不亡反兴,延续数千年而不断,在世界史上大放异彩,其密码正在于此。

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总结说:

“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

① 李大钊在《史观》一文中曾说:“人类的历史,果自何始?曰:不知所自始。果何由终?曰:不知所由终。在此无始无终、奔驰前涌的历史长流中,乃有我,乃有我的生活。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苟不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所趋向,则我之人生,将毫无意义,靡所适从,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第三卷,第2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② 《管子·》

③ 《春秋繁露·》

④ 《六臣注文选·》

⑤ 《春秋繁露·》

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①因此,他提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②

近代以来,欧美列强在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也常常从“历史”开始,或者把他们欲侵略的那些非欧美国家和民族说成是“停滞的”、“没有历史的民族”^③,或者把他们打入“历史”的另册之中,把他们描绘成“野蛮的”、“未开化”或“半开化的”、“传统的”而“非现代的”民族,以便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披上“文明的”、“现代的”的“合法”的外衣,给自己本来极不人道、极不光彩的行为赋予一种“启蒙”、“解放”的光彩。

近代以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由于中国国势衰落,有志之士群倡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制度、文化,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即使在今天,我们仍应继续虚心学习借鉴外国经验,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在学习外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失误。在历史领域,这些失误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误以为西方的历史、历史理论、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著作都是绝对科学的、客观的、学术化的;二是误把中国固有的历史、历史理论、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著作都当成是封建的、落后的、非科学的、过时的东西。显然,这类糊涂认识与现今时代发展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④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大国,光有经济上 GDP 的提高是远远不够的。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人民生活总体上正在往小康迈进。相对而言,我国文化建设虽然也

① 《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著,王佩铮校:《龚自珍全集》,第 21 页、22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② 《尊史》,龚自珍著,王佩铮校:《龚自珍全集》,第 81 页。

③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然是最古老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的客观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第 110 页,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④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第 33~3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取得巨大成就,但总体水平和总体实力同我国经济建设发展不相适应,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不相适应,同改革开放的形势要求不相适应,同我国国际地位不相适应。进入新世纪,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一是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凸显,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文化支撑,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大趋势。二是文化产品和服务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独立的贸易形态,在国际竞争中走向国际前台,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三是文化领域已成为国际斗争的重要战场。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为广泛,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战略。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有效抵御外来思想文化渗透,就必须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切实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不仅仅是著名导演执导出的高票房的大片和名流所写的畅销书,文化软实力更是内化在每个国民身心中的文化基因和遗传密码。历史作为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仅是知识和学术问题,它是中华民族综合国力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历史安全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安全,历史教育是否成功,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实现伟大的历史性的复兴。当代青年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主人,担负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伟大使命,而要完成这一伟大使命,必须学好历史,尤其是学好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熟知中华民族是如何一步步从辉煌的古代走到多灾多难的近代,并最终觉醒、奋起,走上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的。

二、“近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观念,而是有其特定的内容

从词源来看,“近代”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早已存在,它与“古代”和“昭代”等词相对应,指的是离说话者所在的“昭代”,即当代距离较近,而介乎于古代和当代之间的一段历史。从晚清开始,该词被用来翻译西文的 modern 等词。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该词渐成为新兴的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专门学科的代名词,即“中国近代史”。“现代”一词在英文中本与“近代”是同一词,即 modern,但在中文中,它却常常被用来指五四运动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历史时期,现在也有学者拿它来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古代”主要是一个时间概念,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繁衍、融聚、奋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光荣历史,虽偶尔也涉及到周边国家和民

族,但范围始终十分有限,亚洲以外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虽对中国也有所影响,但程度有限。

“近现代”则与此不同。近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与古代极不相同的内涵。

首先,“近现代”是世界性的,是全球化的。^①新的海上航路的发现和全球性商贸网络的建立以及西方列强在此过程中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侵略扩张活动将从前相对孤立的世界连为一体。面对着撞关破门而来的列强,中国近代的先进分子逐步开始认识到,中国只是“列国并争”的世界诸国中的一国^②,在此时代,中国内政“一切无不牵及外交”。^③在此时代,“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问题”^④,“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⑤,因此,中国人也就不得不到世界大家庭中去“讨生活”^⑥,不仅中国各省地方

① 吕思勉著《中国近代史讲义》认为,中国近代史始于明代中叶欧人东来。“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此为现在所处之时期,就此时期之事而讲述之。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其中又可分为二期:一自欧人东来,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此为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一自戊戌政变起,迄于现在,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吕著中国近代史》,第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郑鹤声《中国近代史》:“我国近世史之开端,自新航路之发现始”,“自新航路之发见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继往开来’之趋势,其一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育未来之局势。每以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具体到中国而然,近世史则“上自明代,下迄今兹,包罗近三四百年之事实”。(郑鹤声著:《中国近代史》,前编第一分册编纂凡例,南方印书馆,1944年10月。)

② 康有为等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经常用“列国并争”之类的字眼来形容当时的时代。1895年6月30日《上清帝第四书》:“今通商既开,列国环逼,既已彼我对立,则如两军相当,不能谋其军法兵谋,无以为用兵应敌”,“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法治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法治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中国处此大变动时代,“当以开创治天下,不当以守成治天下;以列国并争治天下,不当以一统无为治天下。”1898年6月《请告天宜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一统闭关之治,与列国竞争之治,若冬夏冰炭之相反、水陆舟车之相异也。今我国处竞争之新世,而行闭关之旧法,安得不危败乎?”1898年6月8日徐致靖拟《清明定国是疏》:“当诸国并立之时,万不能复守秦汉以后一统闭关之旧”。1898年6月17日宋伯鲁拟《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所谓变国是者,在正明中国之在大地为数十国中之一国,非复汉、唐、宋、明大一统之时,其为治,当用诸国并立流通比较之法,不能用分毫一统闭关卧治之旧”。(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49页、152页、第256页、第258页、第2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③ 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第5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④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⑤ 孙中山语。

⑥ 语出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蒋在此书中说:“到了19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蒋廷黻,沈渭滨导读:《中国近代史》,第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都受其冲击^①,各行各业蒙其影响^②,而且整个中国革命也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③。

其次,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上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发展,欧洲资产阶级经过两百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战胜封建主义,在欧洲确立了自己的统治。这一制度以议会民主政治为躯壳,以资本为灵魂,通过血与火等残酷手段,无情地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冲突日渐突出,也由于与资产阶级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逐步成长壮大,与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同的社会主义式的人民共和国的方案越来越成为饱受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选择。

① 例如,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曾形象地描述说:“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教育”。“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于地球上。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② 20世纪30年代初,罗家伦先生曾经评论道:“中国和西洋的接触,并不从最近开始,但是在最近一段里,中国确是和西洋一天一天的增加了许多国际的关系,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影响。不只是军事、经济和所谓一切物质文明,因此发展了新的局势,而且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基础,也因此受了剧烈的震动和变更。现在没有几件中国的事实,是可以离开世界的环境讲得通的。要研究中国政治的改革和变动,非打通国际的情形来看不可;要研究社会的改变和生活,非综合他国的现象来看不可;要研究文化的演进,非考察世界的学术思想不可。”“近代史名称,也不过是就研究便利而划分的一个段落”,“如果史学家从鸦片战争开始讲中国近代史,也不过是为研究便利和人定这件事对于中西短兵相接后,所发生的各种影响的重要性起见,把他当作一个重要时期的开始而已。”(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载《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第137页、136页,1931年3月。)

③ 较早明确提出此观点的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等。1925年8月,李大钊在《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中提出:“吾人之运动口号为尊重民权,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三条。再进一步言之,即非仅中国之问题,乃世界之问题也。帝国主义已至一定程度,将来中国革命成功之一日,即世界问题解决之一日,即世界革命成功之一日。”次年5月,他在《政治生活》第76期上发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在介绍了马克思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有关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评论后指出:“我们读了马克思这篇论文以后,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在世界革命的运动中,中国和英国所居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英国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中国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就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市场的缩狭;这个缩狭,可以促起普遍危机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发。这种英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造成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更以其影响还答于英国,经由英国还答于欧洲,造成了英国革命,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关系。在马克思生存的时代,就是太平天国动乱的时代,是如此;即在今日,中国全国爆发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时代的,亦还是如此;直到世界革命完成的那一天为止,总是如此。不过这种关系的暴露,一天一天的明显,由中国革命以趋于世界革命的倾势,一天一天的逼近罢了。”(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第5册,第48页、第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轻的毛泽东也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密切联系。有关此点,参见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1~2页。

再次,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正如上世纪30年代的学者所评论的那样:“近代世界文化有两种重要的特别:一种是自然科学,一种是机械工业。这两种特别引起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如大规模的民治,兼领数洲的大殖民帝国,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斗争,支配世界市场的大公司等。上次(指第一次——编者)世界大战以前,全世界的文化发展,似乎有共同的趋势;素不行政治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土耳其、俄罗斯都像望着民治走,未曾使用机械的国家,也步步的踏入工业革命的园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苏联等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走上了法西斯道路,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立场“虽一个站在北极,一个站在南极”,但“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都是维护的。世界的一切都可革命,谁都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尚未闻有革命之声。左派的,右派的,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男的,女的,白种,黄种,老年,幼年,没有一个肯树反自然科学和反机械工业的旗帜。所以我们如说中国必须科学化及机械化,并且科学化 and 机械化就是近代化,大概没有人反对的。这种科学机械文化发源于欧洲西部,近代史就是这种文化的发展史,欧西以外的国家都是被这种文化征服了。抵抗这种文化的国家不是被西欧占领了,化为殖民地了,就是因战争失败而觉悟,而自动地接受这种文化,胜利的抵抗是没有的,能利用这种文化来生产,来防守国土者就生存,不能者便灭亡。这是近代史中的铁律,没有一个民族能违犯的。”^①

近现代的这些特点,是我们研究和探讨中国近现代史时不能不时时加以注意的。换言之,我们要想深入了解和更好地认识近现代的中国,就必须充分注意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与互动,关注此种关联与互动的潮流与方向。

三、近现代历史的主题是建设现代国家

中国近现代史作为大学正式开设的课程,最早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②在学科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以罗家伦、蒋廷黻为代表的“近(现)代化”派和以李鼎声、范文澜、胡绳等人为代表的“反侵略派”。两派虽然在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这一点上是大体相同的,但对于整个近代历史发展的认识框架及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等却存在着很大分歧。一般说来,“近(现)代化”派把“近(现)代化”看成近代历史

^① 蒋廷黻:《中国近代化的问题》,《蒋廷黻选集》,第四册,第637~638页,台北,文星书店出版社,1965。

^② 有关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基本过程及整体情况,参见张海鹏、龚云著:《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欧阳军喜:《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发展的动力,认为中国只要能够学习西方,实现近(现)代化,中华民族就能复兴。^①“反侵略”派则认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只有彻底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派,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统一、人民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②“研究近代史,就是为了提醒人民,警惕帝国主义会利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可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③这一派要证明的重点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不同的待遇,以及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④

两派学者在当时所进行的近代史研究及进行此种研究时所运用的思想框架和提出的主要观点,基本上是为服务于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进行的,分别代表了当时中国政坛上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立场。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的历史也已经对两个派别的近代史主张做出了某种结论:坚持革命、争取民族独立的中国共产党受到人民支持,建立了新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围绕着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到底是革命还是近(现)代化

① 这方面,蒋廷黻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在《中国近代史》一书的《总论》中指出:“到了19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洋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18世纪中年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19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19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蒋廷黻,沈渭滨导读:《中国近代史》,第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又说:“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都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同上书,第15~16页)

② 参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序言》,1946年。

③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六版序言。

④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香港初版序言。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①，他们的研究从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深化了我们对于近代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研究从总体上看，注重了历史的某一层面或某些层面，而对近代历史的主题或母题则缺少全面、总体的把握。而讨论中所用“近(现)代化”等术语本身含义的不确定性^②不仅会时常引起论争，而且也确有一些殖民主义者利用这些术语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护。^③这些都妨碍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在近现代面临着双重历史任务，一方面必须革外国帝国主义和勾结外国帝国主义的中国封建主义的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另一方面也要学习西方，实现中国的近(现)代化。但是，在这两重任务中，革命不是为了革命，近(现)代化

① 有关讨论可参见刘大年：《方法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近代史研究所卷），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一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第136~147页（第一章《现代化的研究视角与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评价和方法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2月14日；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龚书铎：《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华魂》，2006年第3期；冯钢：《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王旭东、黎俊祥：《以现代化为主线略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井建斌：《正确评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5期；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卷，《绪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1日。

② 这方面，“近(现)代化”一词表现最为突出。在中文中，该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30年代，主要指工业化，即经济生产领域中利用现代机器生产代替传统的手工或半手工生产。30年多年，即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在冷战的高潮中，欧美学者用现代来指“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用传统来“落后”的非西方社会，认为如果非西方社会要摆脱传统、进入现代，就必须学习西方，采用资本主义制度，使“现代化”一词等同于“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从而使该词具有了强烈的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色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将该词拿来讨论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但在使用该词时，各家往往各取所需，“现代化”一词的含义也就更加模糊。

③ 例如，一位研究德国现代化的学者就曾援引德国海军军方的文件，对德军1897—1914年占领中国青岛并在此实行殖民统治的行为作如下辩护：“把工业引入青岛地区，这使中国居民获益匪浅；……对于帝国海军当局来说，铁路、技术转让、基础设施建设比获得某些实惠更重要。凡此种种足以驳斥那种认为海军是怀着剥削、掠夺的殖民主义动机到胶州的观点。”（余凯思著：《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第12页，孙立新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而这类“现代化”主导的研究造成的情况是：“简化为现代化的进步在殖民化中有其秘密范式：一个被传统所阻塞的发展的领域陷入了市场的和受市场制约的国家行政管理的漩涡。这种把进步与现代化等同的做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所有反对它的政治抵抗——不论是殖民地人民起义、农民暴动、纺织起义还是平民主义斗争——都可以被记作‘反现代主义的抗议’而受到指责。”（余凯思著：《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新译，第13~14页）。

也不是为了近(现)代化,革命和近(现)代化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最高目标,那就是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换言之,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而革命与近(现)代化则是完成这一主题的两重大手段。

建设现代国家,一般简称为“建国”,并不是简单地指创建一个全新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建国”指的是按照现代国家的标准和要求,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在原有基础上改造或建设一个对外拥有独立自主权、内部社会秩序良好、经济文化繁荣发达、人民不仅需要尽其应尽的义务而且还享有各种应该享有的权利,从而能够安居乐业的国家。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的先进分子们就感到:“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①从那时起,中华民族如何在强国如林的近代世界中“自立于天下”而不为“天下万国所鱼肉”^②的问题,就日益迫切地摆到了全国人民面前。

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以清廷为中心,一边节节抵抗列强的侵略,一边尝试对内政外交的相关制度进行改革,并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机械化生产及相关制度,发起以国防建设为主、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实事求是地说,清朝皇室及政府在主观上无疑是很希望中国能够像西方列强一样强大,这样才能保持中国的体面和尊严,为此,他们不仅采用西方近代先进的机器生产及相关制度,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双管齐下,既在国内设立新式学堂,又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以培养中国自己的专门技术人才,甚至连光绪皇帝也在慈禧太后的安排下,开始学习英文,研究西学^③,但由于其内部的不统一和国策的不明朗,由于对外的一贯妥协退让,对内尤其是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其努力收效甚微,不仅不能有效抵抗列强的侵略、挽救国家的危亡,反而日益将国家推到灭亡的边缘。甲午战争以后,仁人志士痛感于“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聚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满洲政府既无力以御外侮,而钳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近代文献丛刊),第4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近代文献丛刊),第51页。

③ 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等都报道过光绪皇帝学英语的消息。李鸿章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月十三日写给其子李经方的信中亦曾称:“皇上去冬传同文馆学生入内教洋文(奉太后命,诸臣皆不谓然),闻已熟四拼字。”(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第96页);曾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对光绪学英文一事亦曾有过详细描述,说光绪皇帝从1892年前后开始学习英文,每天凌晨4点准时开始,而负责教光绪的老师则要半夜起床赶至皇宫等。(Martin, W. A. P.: A Cycle of Cathay, 原书出版于1896年,今据首尔:韩国景仁文化社出版,2000年版,第340~341页)